

東下論叢

胡繩

寒 下 論 丛 、

胡 绳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0 · 插頁 2 · 字數 239,000

1962 年 8 月第 1 版

1963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10,501—22,500 定价 (六) 1.20 元

統一書号 3001·661

目 录

五四文化运动中的革命精神·····	1
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 ·····	7
我们要向鲁迅学习什么? ·····	21
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27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45
鄒韜奋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斗争·····	56
論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69
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	90
为什么要批判胡适派、胡风派的思想? ·····	113
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而斗争·····	130
向列宁学习怎样进行思想斗争·····	139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	147
——論現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184
从“不满”说起·····	206
絕不允許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214
爭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彻底胜利·····	223
关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238

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义	257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札记	275
一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自以为能起什么作用	275
二 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不清楚社会究竟是什么	280
三 资产阶级社会学怎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288
四 资产阶级社会学对人民群众的看法	294
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302
后记	316

五四文化运动中的革命精神

五四运动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的文化战线、思想战线上，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五四运动以前，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介绍到了中国来，这种文化思想比起封建时代的旧的文化思想来，当然是新的东西。但是，当时介绍这种新的文化思想的知识分子，多半还不敢把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坚决地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企图在新东西和旧东西之间，找寻调和与妥协的办法。

敢于向封建的旧文化思想进行大胆的攻击与斗争，是从五四运动才开始的。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又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思想，反对殖民地奴化的文化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这种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腐朽的、反动的旧事物的精神是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优良传统。

因为五四运动具有这样的革命的姿态，所以当时的文化思想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页692。

战綫显得非常生动活潑，充滿了勇敢的批判精神和大胆的創造精神。

在五四运动中，先进的知識分子的确是十分大胆和十分勇敢的人。在他們面前的敌人——旧的文化思想，是很强大的，是根深蒂固的，是为专制主义的政治势力所維護着的。但他們无所顾虑地发动了挑战。他們的口号是对一切旧的事物重新估价。凡是他們认为对民族的生活、人民的生活不利的东西，他們就敢于实行无情的批判。他們不輕信，不人云亦云，不受习惯成自然的欺騙。在他們怀疑和批判一切旧的东西的时候，也批判了他們自己，因为他們自己就是从旧社会中出来的。他們敢于发现和創造新的东西。他們充滿着热情追求新的东西，因为他們相信，沒有这种新的东西，中国的民族生活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他們在旧势力的嘲笑和压迫之下，生气勃勃地鼓吹着新的东西，虽然这些新的东西在眼前还是比较微弱的。他們深信这些新的东西具有远大的前途和不可抵抗的力量。

但是，并不是每个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同等地具有这种革命精神。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只是一时地参加了革命，当他們看到新的事物和群众的力量超过他們所能承认的限度而出現的时候，他們就張惶失措地退却下去，和旧的文化思想进行妥协。在五四运动中，也有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他們不但在五四运动当时是文化战綫上最坚定的战士，而且他們还把这场战斗繼續向前展开，使新文化运动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結合。就是他們，再加上参加五四运动的許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識分子，形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勇敢先驅者的队伍。他們在当时，对于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掌握虽然还是不够熟练的，但他們立刻运用了他們新学到的这种武器来加强他們对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当时，从十月革命中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还經受着内外

敌人的猛烈反攻，但是他們已經能看出，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偉大意义的新生力量，他們立刻把新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当时中国的工人运动虽然还在萌芽时期，但是他們立刻就敢于去承认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远大前途，并且决心去在实际上和工人阶级相结合。五四运动的革命的批判精神和創造精神最高度地表现在他們的身上。

这种批判和創造的革命精神，在現在看起来有什么意义呢？毫无疑问，在現在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继承和发揚这种革命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我們的文化思想战线已经是建立在远比五四运动时期高得多的水平上。通过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斗争实践，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被证明为不可抵抗的真理，并且已经形成了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澤东思想。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了偉大胜利，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更造成文化和广大的工人农民相结合的空前有利条件。数以百万計的旧知識分子为革命胜利的潮流所推动而重新学习，进行思想改造。这一切就给新中国的文化运动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远景。但是必須指出，我們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还赶不上革命的实际和人民的需要。人民大众对于内外反动敌人已经胜利地用武器进行了批判，但是我們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还没有以同样的規模發揮批判的武器的威力。在国家的生活和人民的生活中，每天出現着自古未有的新的事物，但是这些事物，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为了迎接那将要随着經濟建設的高潮而必然到来的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一定要加倍努力。

站在比五四运动高得多的水平上，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毛澤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們要很好地向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学习。这种革命精神要求我們毫不留恋地对旧的坏的东西进行批

判。兩三千年的封建時代和一百多年的帝國主義的統治，給我們的民族的文化生活染上了許多骯髒的東西，這些是我們必須下決心去徹底肅清的。我們要堅決地保衛真理，堅決地否定一切不健康的舊的東西，那怕這舊的東西已經幾乎血肉相連地附着在自己的身上；否則，我們就不配做五四運動的革命精神的繼承人。這種革命精神又要求我們大胆地使文化與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相結合，一方面改變歷史所造成的中國人民中的愚昧的狀態，另一方面使勞動人民中的智慧和力量成為中國新文化的不竭的源泉。這種革命的精神更要求我們不要老是津津有味地咀嚼舊的不合時的教條，不要滿足於已有的成就。國家的生活和人民的生活每天在提出新的要求、新的問題，我們必須敢於接受這些要求，答復這些問題，使我們的民族文化活動無限地豐富起來，不斷地提高起來。既然在三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凭着這種革命精神，就展開了文化戰綫上的新的局面，我們在今天一定能夠掀起更大規模的文化革命的浪潮。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那種革命的熱情，那種大胆地懷疑和批判的精神，那種不倦地追求新事物的精神。

在五四運動的思想界中，也顯著地存在着一種弱點。對於這種弱點，毛澤東同志曾給以這樣的說明：“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①這樣的弱點，特別在當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表現得最為顯著。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往往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沼。當時開始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由於他們還不善于具體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① 《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頁833。

运用得还很不熟练，也难免于这种弱点。

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得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虽然具有革命热情，却比較缺乏科学分析的能力。这就使他們不能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和批判，因而表现为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例如，他們简单地抹煞了一切封建时代的旧事物，好像那不过是历史的錯誤和愚蠢的产物。他們也往往脱离了现实的历史条件而号召和提倡某些新的事物，以至这种号召与提倡带着空想的性质。他們不善于把同一事物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分析开来看待，因而他們不能区别中国历史上带有人民性的东西和屬於封建統治階級的东西，更不能看出在旧时代的人民大众的东西中，一方面虽然不可避免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形成了某种落后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我們一方面要十分重視五四文化运动的革命性，一方面又應該看出五四文化运动的科学性不足的这一个弱点。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結合。革命性——这是說，敢于摧毁旧的，敢于肯定和发展新的；科学性——这是說，要进行客观的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实事求是，辯证地掌握事物中的全部因素。科学性与革命性——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五四运动的文化思想战綫在某些方面比較地缺乏科学性，也就不能不对它的革命性造成若干消极的影响。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能够克服五四运动中的这种弱点的只有无产階級的思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者发揚了五四时期的积极的革命的因素，并且逐漸糾正了它的缺陷。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就是結合了高度的革命性与高度的科学性，正确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問題的光輝的典范。

当前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发揚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更大規模

地展开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并且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克服一切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残余，而使我們能够更正确地、更有效地发挥革命的精神。为此，就必须更认真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澤东思想。

(一九五〇年五月)

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 反动思想的表现？

电影《武训传》和许多歌颂武训这个人和《武训传》这个电影的文章究竟有些什么错误呢？

这个电影和这些文章的错误是，它们把在中国封建制度开始崩溃时代的一个可卑可耻的渺小不足道的小人物，捧到了神圣的殿堂上去。武训这个人一生所作所为究竟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他是一个乞丐，向任何人磕头求乞；他忍受各种屈辱和践踏，并以受辱为愉快；他干各种非人的行为（例如吃蛇、蝎、粪、尿），把自己装成小丑，为了得到“赏钱”，他做牛马做的工作，并以自己能代替牛马的工作而洋洋得意。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封建统治下的奴才道德的极端突出的表现么？在阶级剥削社会中，贫穷、受侮辱、受损害，并不就是可耻的。劳动人民一般地过着穷苦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活。但因为贫穷而流为沿门托钵的乞丐，而且甘于为乞丐，乐于为乞丐，甘于被侮辱，乐于被损害，这才是最可耻的。武训的可耻可卑，甚至还更甚于此，因为他给他的卑污的生活找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这目的就是办“义学”。他把行乞得来的钱通过地主绅士放高利贷，自己一个钱不花，“感动”了地主、绅士、官僚，以至“朝廷”，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资助，于是终于办成了由地主绅士阶级中的“有学问”的人所主持的“义学”，使得有一些儿童有“荣

幸”受地主階級的教育。武訓用這樣的行為來表示：一個窮苦的人，無論怎樣受侮辱，受損害，無論過怎樣下賤的生活，都要忠心耿耿地保衛封建統治秩序，保衛封建統治者的道德思想；而能夠這樣做，就能够得到統治階級的嘉獎。

這樣一個武訓，在當時受到地主紳士的贊助，受到專制皇朝的獎勵，後來又為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所表揚，並為一切封建主義者所推崇，那是不足為奇的。但為什麼至今還會有許多自以為站在“進步”立場來認識武訓的人，十分傾倒地歌頌這個可恥可卑的乞丐和奴才呢？是什麼東西障礙他們看出武訓的實質呢？是什麼東西使他們甚至在企圖“批判”武訓的時候，還是捨不得不宣揚武訓的“可敬可愛”之處呢？如同《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社論所已經明白指出的，這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在人們頭腦里作怪的原故。

在這篇文章里想要說明，為什麼正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使得人們在觀察武訓這個角色的時候，陷入了如此嚴重的錯誤。

二

曾有一些歌頌武訓的文章的作者說，他們對武訓的估價是歷史主義的看法，而蔑視武訓則是出發於反歷史主義的觀點。例如，認為武訓具有“自我犧牲為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的程慶華說：“我們認識一個歷史人物必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不能拿現代的人物與歷史上的人物比較，來衡量他們的輕重。”^①又如，董渭川斷定：“武訓這個名字應該說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並且說：“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偉大人物和偉大事跡，如果拿今天的革命成就來比較衡量，恐

① 《進步日報》1951年4月4日。

怕都有被否定的可能，但是只要在历史上称得起偉大的人和事，我們就應該从那个人代表的精神和那件事完成的过程，以及人和事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还应该重視和发揚的某些优点，作肯定的介紹，似乎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作否定的結論。”①

我們得到否定和蔑視武訓的結論，究竟是不是因为我們采取了一种拿“現在的尺度”衡量古人的粗魯办法呢？

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應該采取这种粗魯的、錯誤的办法。如同列宁所說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問題时，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內。”②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时，也不能違反这“絕對的要求”。在这“絕對的要求”中，表現着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的严格的科学态度。

难道对武訓的歌頌反而是从科学地分析历史而达到的結論么？事实上沒有一篇歌頌武訓的文章，具体地說到了武訓所处的时代。宣称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程庆华甚至似乎不知道武訓是死于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的一个人，他的文章中說：“武訓生长在数百年前的封建社会里。”所有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而在空洞地歌頌着武訓这个人“所代表的精神”。他們並沒有，如同《人民日报》的社論所說的，“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經濟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經濟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贊或歌頌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贊或歌頌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武訓生在鴉片战争前二年（一八三八年），死于中日战争后二年（一八九六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因受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

① 《光明日报》1951年2月28日。

② 《論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頁401。

的侵略而急速地降入半殖民地地位的时期，封建社会秩序受到强烈的震动，迅速地开始分解。农民大革命成为迎接历史新时代的先鋒。据说武训在十九岁（一八五七年）开始有兴学大志，那是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七年，占领南京为首都后三年。太平天国虽然在一八六四年失败了，但继太平天国之后的“捻党”和其他农民起义一直继续到一八七〇年左右。农民大革命的浪潮催送封建秩序的死亡，清皇朝的统治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才能苟延残喘。武训办成他的第一个“义学”是在一八八七年，中法战争后三年。其时，清朝统治者害怕农民革命的再起更甚于害怕外国的侵略。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上皇帝书》中描写当时的情势是：“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他劝告皇帝实行“变法”，否则，他警告说：“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就在一八八八年，山东巡撫召見武训，朝廷打破官僚主义的因循慣性，立即傳令嘉奖，这和当时的情势的关系是很显然的。

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很明显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是旧的、正在死亡着的事物，武训正是属于旧事物的一个渺小的奴才。坚决地起来和这种旧的事物进行斗争的是农民革命。从一八五〇年后綿延二十多年之久的农民革命的偉大力量阻止了外国资本主义强盗完全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把清朝的黑暗统治打得摇摇欲墜，并且使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得以在殘敗的封建制度之上开始生长出来。

在农民革命的大浪潮过去时，中国开始出现机器工厂、輪船局和电报、火車等。但是近代化的工业的发生过程是異常緩慢而困难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没有形成。仅仅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貴族知識分子身上，开始透露了资本主义傾向的改良主义政治要求。康梁的“百日維新”是在武训死后二年发生的。

这些貴族知識分子的改良主义者們仇視农民革命运动，这是

他們的反动性的一面，这种反动性使他們后来墮落为保皇主义。但是在維新运动时期，他們的改良主义还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他們違反頑固的封建势力的意志而企图按資產階級方向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封建王朝报答他們的不是傳令嘉奖而是判处死刑。

由此可見，就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看，武訓不但和当时的农民的革命主义背道而馳，而且也不能和当时的資產階級性的改良主义相提并論。武訓的思想并不是什么別的东西，而不过是极端地忠于封建主义的奴才主义，至死不悟的保皇主义。

但武訓的歌頌者提出了两个脫离具体历史环境和違反历史事实的論点：

第一个論点：武訓是立意为人民的“文化翻身”而“奋斗”的，所以值得歌頌。做这样的歌頌，实际上就是說，完全不触动旧的社会經济形态，旧的政治，只要在人民中进行文化教育——甚至也完全不管教育的内容，就可以改变人民的被压迫的地位。

第二个論点：如果說，武訓並沒有实现解放人民的目的，那么他的失敗也正如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失敗一样。抱着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武訓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抱着同样的目的，并且是同样地遭到了失敗，所以，武訓的历史地位即使不高过农民革命，至少也是和当时的农民革命同样的。

讓我們进一步分析一下，这种认为离开政治斗争，人民可以在文化上“翻身”的看法，这种实际上是为提高武訓而抹煞和侮蔑农民革命的看法，究竟是从什么观点而来的。

三

电影《武訓傳》提出了用办义学来“解放”人民的思想。电影中用形象告訴人，穷人因为不識字所以才吃亏，地主因为有笔在手就可以生杀予夺。所以武訓的努力是造福于人民的，至少他的“动机”

是十分善良的。董渭川的文章鮮明地說：“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須透过教育。”电影中借参加武装斗争的周大說：“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們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①

这种“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評論者的附和。說得最明白的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长之的文章。他說：“武訓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軍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长之的文章又說，电影中是“批判了武訓兴学的革命意义之限制性，让人觉得只有二者合起来，再加上正确的领导，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国今天这样子”。这就是說，“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确的领导”。这位作者如此热心地表揚武訓，显然正是为了想說明，甚至在造成“中国今天这样子”的革命中，武訓式的人也是和武装起义的群众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

首先，把“革命”企图摆在武訓身上，是一种捏造。根据关于武訓的真实的材料，武訓并没有梦想过由办学来改变封建統治秩序而“解放”人民，他其实是为了尊重封建統治秩序，所以才立志办学。在封建关系下被压迫的农民也不会发生这种梦想。因为农民或者由于其长期被压迫而形成的保守性不敢进行反抗，把一切归于“命运”，或者由于忍受不住被压迫生活“揭竿而起”，造反。从残酷的封建統治秩序中不能产生这种靠文化教育就能解放人民的幻想。这种幻想是武訓的歌頌者加到武訓身上去的，是用一种“自由”资产阶级的調子唱出来的幻想。

其次，武訓歌頌者所加于武訓身上的这种幻想甚至还落后于当时的具有资产阶级傾向的貴族知識分子。如我們前面所說，康

① 孙瑜著电影小說：《武訓傳》，頁136。

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究竟还是要去触动封建统治秩序，那怕是很少的触动。康有为也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他要求废科举，开学校；他要求学校中教授“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等^①。当然，康有为并没有主张根本推翻封建教育。他只是主张按资产阶级的方向在教育上进行一种改良，这和他他在政治上的改良主张是相适应的。如果实行这种改良，封建统治秩序就不能不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动，这是当时的封建统治势力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武训怎样做的呢？他只是按照地主官僚的方向而办义学，在他的“义学”中，封建教育的内容分毫也没有改变。所以在当时康有为的思想还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萌芽时期的思想的范畴，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这个贵族知识分子身上只能表现为十分软弱的改良主义，而借用武训来表现的这种文化教育普及论却完全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范畴的。

不应该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在革命斗争时期，宣传进步的文化思想，以提高群众觉悟，推动政治斗争，是有价值的。但要使进步的文化教育真正在人民大众中普及，当反动政权没有推翻时，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是不应该去设想的。如果是在不进行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的条件下的“普及文化教育”，那就只能是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是随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而来，绝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变革的前提。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的投降。

电影《武训传》和有些武训的歌颂者不也是指出了武训的失败么？但问题并不是，用普及文化教育来解放人民究竟能否实现。因为现在，事实上，中国旧时代中的一切教育救国论都已经宣告破

① 见一八九五年《上皇帝第三书》。